

採訪報導

專訪楊思成教授、楊思明教授 談楊家駱先生

訪問：林慶彰、楊晉龍*

整理：楊晉龍

著名圖書文獻學家、前國立臺灣大學教授楊家駱先生，民國八十年九月十一日逝世於臺北三軍總醫院，距生於民國元年正月初四日，享壽八十歲。遺屬外貿協會顧問楊思永先生、美國羅德島州立大學教授楊思成先生、國立中央大學教授楊思明女士，為貫徹其父整理、保存文獻之心志，分別在民國八十年十月十三日及十一月二十五日，將楊家駱先生之手稿和藏書，約二萬冊，捐贈給本所。為了解楊家駱教授一生奉獻於整理保存中國圖書文獻的動機和目的，本所特於民國八十一年元月二十三日下午，在本所會議室訪問楊思成、楊思明二位教授，以下即採訪之內容。

林慶彰先生：

楊家駱教授是位令人尊敬的學者，楊先生從小耳濡目染，很多事一定比外人知道的更多。比如說他辛苦的編輯許多書，我們見到的只是一本本的成品，至於經過的狀況，就無法得知了，所以現在想就我們希望瞭解的事情，擬出幾個問題，請您來談談。

* 林慶彰先生，本所副研究員。

* 楊晉龍先生，本所短期研究助理。

楊思成教授：

謝謝您。我們希望盡量提供所知以作參考。

楊晉龍：

楊家駱教授在大陸時，早已編有《四庫大辭典》、《民國以來出版新書總目提要》、《中國文學百科全書》等大型工具書，飲譽學界，是否可以就您所知，談談當時的編輯情形。

楊思成教授：

這些書都是先父早年編成的，他做這些書的動機是希望把中國很豐富的知識整理出來方便大家用。他認為中國的古知識很豐富，但因為古人沒有用科學的方法加以系統的整理，所以後人常常不能很有效的去利用。中國的很多學問，比如說音樂、醫藥，及其他多項科技都起步得很早，可惜未能在前人既有的基礎上再進步。中國這麼多年來，雖然有很好的東西，但由於沒有建立資料系統，所以無法有效的發展。他希望由工具書的編著，而讓人對中國古代的學問作有效的利用。他常常講：「知識需要整理，使用起來才有頭緒。」他對於工具書的興趣大約是受到祖父的影響，祖父年輕時對於十九世紀法國的百科全書學派至為嚮往，祖父曾經著手翻譯法國的《狄岱麓百科全書》，可惜祖父過世的早，所以沒有完稿出版。父親也就是想把這種整理知識的方式，利用到中國的學問上。

他對於原始資料的重視可能是他致力開發工具書的原動力之一。他說今人讀古書，可以取不同的角度作分析而有多種收穫。他在大學教書，指導學生論文時常建議學生以分析古籍作為透視中國古代文經的方式之一。他常提醒學生，後人的詮釋祇代表分析原始資料的角度之一。若希望能有新的收穫，還是要讀原始資料。基於這種信念，他曾努力收集世界各地的明朝《永樂大典》以補充散失的原始資料。

在他收集原始資料的過程中也偶有意外的收穫，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四川「大足石窟」的發現。他在尋訪四川地方人士刻印的書時，讀到唐宋之間曾有石刻藝術豐富的佛教密宗聖地位於四川大足的山區，他得到政府及地方人士的幫助，而組織了一個「大足石刻考察團」，將中國的藝術寶藏公諸於世。

他本不是研究考古學的，居然從尋訪到的原始書中得到一個可喜的收穫。我猜想他很願意見到別人因為工具書的方便，而能更廣泛的使用原始資料。

另外他也有個看法，就是要整理中國很豐富的文化遺產，並不是很容易的原因是：從前治史時，都以政治和軍事為主，現代人所關心的經濟、人文等問題，並沒有特別有系統的介紹，因此他很有興趣反過來做，去蒐集古代關於經濟發展、社會制度、社會風俗等等的資料。以前的史籍所記載的，多是什麼時候打什麼戰、誰做皇帝這些事，當初中國歷史即以這些做為線索，內容雖然豐富，但他認為現代人有興趣知道的是古時文化、經濟、制度怎樣，所以要用各種方法，把中國的古知識重新整理，重新弄出一個頭緒來，以便大家使用。

楊晉龍：

楊家駱教授和世界書局的關係很密切，所編的《中國學術名著》對學界的貢獻也很大，是否可以請您談談有關的情形。

楊思成教授：

編輯《中國學術名著》，是相當合乎父親最初的志願和理想。我們在前面談到先父對原始資料的重視，使他早歲致力於編著工具書以便利他人使用原始資料。他後來在臺灣印書，也是因為苦於在當時的環境下，在臺灣的中國古籍資料貧乏，所以才有「間日出書一冊」計畫之施行。

在這個工作中，共出版八百冊的中國古籍。為了使讀者能方便使用這些原始資料，他在出版前對這些書作了一些「加工」的工作。這個工作後來有了信用性，真的能照出書的規程印出，漸漸購買的人也多了，也就變成世界書局的一個很重要的收入。每部書開始時的銷售量並不大，但由於是長期的，且已建立了可靠性，所以國內外的圖書館大多買了。

林慶彰先生：

當時世界書局的《中國學術名著》中，編有不少的大陸書，以當時的政治環境，書禁的嚴苛，很冒昧的想請問您，當時楊家駱教授是用什麼方法，把這些大陸書引進來的？

楊思成教授：

引進這些書，當然不是父親一個人的力量所能做到的。當時的政策是所有中國

大陸出版的書都禁止輸入，以便於法令的執行。但爲了中國文化持續，許多大陸出版的書籍是不容忽視的。所以在這方面，他是得到當局的諒解。在當時的行政機構中，也有很多有見識的人，他們能夠瞭解這個重要性，而給予協助。遺憾的是，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下，這部分的書未能標明其大陸的來源。後來有人告發他窩藏匪書，雖然他不從事政治活動，但有這些書藏在家裏，不得不擔負這些風險。不過他進書都是有選擇的，進的都跟政治類比較沒有關係的書。

那個時候，我唸中學，妹妹讀小學，那段時間，他睡眠很少，平均只有睡五小時，本來以爲他這個樣子會把身體弄壞，但他卻有非常高的興緻，也許是因爲精神上的愉快，身體的狀況相當好。父親雖然很忙，但是每個週末，一定帶我們出去走一走，當時臺北沒有多少遊樂的地方，大部分是去圓山動物園、或新公園，然後再上小館子。

林慶彰先生：

我想再請教一件事，當楊家駱教授在世界書局時，他編了那麼多書，等他離開以後，書局也就不再編了。我們很想知道，當時楊家駱教授爲什麼要離開世界書局，是不是可以請您談談。

楊思成教授：

先父原計畫繼續出版《中國學術名著》，但他離開以後就停止了。我個人以爲這是讀者的損失，同時也是世界書局的損失。

臺灣的世界書局是公司的分局，父親到臺灣時，書局的財務不好，父親以重印《英漢四用辭典》的暢銷而使書局財務轉好；接著推動他的理想，印《中國學術名著》，後來也變成替公司賺錢的重要出版。當時父親有個想法，不希望書局太依賴教科書，因爲教科書一個學校是不是採用，影響銷售量很大，他不太喜歡當時同業對教科書推銷的方式，他常常擔心公司人員在推銷時會面臨職業道德的抉擇。但是公司也需要開拓財源，所以就印《英漢四用辭典》，相當暢銷；後來的《中國學術名著》，不僅是他的興趣，而且他也有把握做得出來，果然使得公司的營運相當不錯。

公司賺錢之後，就碰到幾位大股東要把利潤收回的問題，同時他們也有不同的想法，就是要怎樣才能更賺錢。他們不喜歡《中國學術名著》的細水長流式的利潤而要公司改組，而與先父及支持他的股東們意見不合。後來，公司奪權的爭執開始

影響到家庭的安寧，我記得中學時家中會接到騷擾及恐嚇的電話，他又得常上法庭回答訴訟。雖然他在法律上以及公司的經營上都站得住腳，他最後還是爲了家庭而辭職。可惜在他辭職後，原來極爲成功的出版及文化工作也停止了。

林慶彰先生：

這可以說是爲宣揚中國文化，付出很大的代價。

楊思成教授：

這個歷程對先父是一個精神上的打擊。

林慶彰先生：

現在也差不多是這個樣子，就是說現在如果有人要做這種宣揚中國文化的工作，也會有人去告發。這些人不知道把中國文化看成什麼？以爲自己是愛國主義者，所以看到有人引進「匪書」，就認爲是犯上滔天大罪了。

楊思成教授：

以我的瞭解，兩岸交流的情形，現在是好得多了。

我認爲兩岸的文化交流，是個很重要的事情，在經過這麼多年的隔離，兩岸在文化上已有相當大的差異；思想上也有差異，因而在兩岸人民開始恢復交往之初有不少關於負面經驗的報導。這應使我們警覺，文化、出版及意見的交換是不容忽略的。許多年來的隔離而造成某些文化上的「溝」，不是單靠通商可以彌補的。兩岸出版物的交流，應是要務之一。

楊晉龍：

楊家駱教授離開世界書局以後，又爲鼎文書局編輯了相當多的書，最著名的當然是《十通分類總纂》，現在想請您談談楊家駱教授和鼎文書局的關係，以及編輯這些書的經過。

楊思成教授：

這些事我妹妹可能比我知道的清楚，因爲這時差不多已接近我出國唸書的時

間。不過我是知道父親在經過世界書局這個管道出書行不通後，就開始教書，在師大、文化，最後最長的時間是在臺灣大學。但在這中間，他一直想再做這一方面的事。

楊思明教授：

基本上父親心裏面一直想印這些中國的書，所以有這個接觸以後，就覺得有這麼一個新管道可以利用，因此就經過鼎文書局印了不少書。

楊晉龍：

我們都知道楊家駱教授生前有個最大的心願，就是編輯一部《中華大辭典》，但是一直未能完成，這個過程，是不是也請您談談。

楊思成教授：

父親事實上知道這個不是他一個人能完成的事情，他做的意思是爲了總要有人開個頭。另一方面做出來了，能夠引起做研究、做學問的人對這方面有興趣，另外也想試做一個體例，當然最主要的是《中華大辭典》這件事，並不是和其他工作可分開的。

我曾經問他：「既然知道不可能完成，爲什麼不做稍微範圍比較小一點的呢？」但是他還是繼續做蒐集的工作，比如說一年半以前，他身體的情況尚佳，暑假的時候，我請他到羅德島州小住幾星期。但他來到美國之後，並沒有作休閒活動，而是去訪問美國的圖書館。當時我曾建議他放棄大部頭的計畫，寫點回憶錄或完成一些小型計畫。他說：「不行！現在還太早了，至少在五年或十年以後，現在有力量的時候，還是要做幾個大計畫的推行，想把它作完。」

當時我提到他似乎又爲新的計畫開端，這豈不是爲自己找麻煩嗎？父親解釋說這些看似新的計畫並不是新的，這些全部是他要做的一件事情的幾個部門，那也是他整理文獻的一種方法。他說整理書籍、編纂書目，或是像《四庫大辭典》、《新書總目提要》等這些概要、提要的東西，都是爲了幫助人家如何好好的去利用一些書。或者從各地的方志中找出資料滙聚在一起；或者把丟掉的、已經遺失的書，把它找回來，比如說《永樂大典》已經散在世界各地，他就把它找回來。若是有殘缺的，就從別的資料裏找來補進去。他做這些工作都是爲了把我們中國古代的知識、

文化遺產找回來。這一部分的工作是先把現在所有留存的東西全部整理出來，告訴人家有什麼東西；再進一步就告訴人家你要看什麼東西，我可以幫你到那裏去找，這時候還是一本一本的書，要是你想到一個字或是一個詞，想知道這個字或詞在中國古代究竟有誰提過？出處在那裏？或者說你已經知道出處，但你有興趣想要進一步知道它周邊的相關內容，你要把這些原始資料找來，《中華大辭典》就是爲了要幫助人家去找這個原始資料、中國文化遺產而編的。所以它是以字跟詞的排列方式來作索引，在這個字之後，也一定用原始資料，並且註明出處。所以可以經過這個字得到一個初步的解釋，但這只是目標的很小部分，更重要的是幫助你要深入瞭解的時候，知道這個資料在那裏，所以這書也相當於一個大索引。

中國文化的遺產是這麼多，若要不漏的話，那是相當大的工作，他也知道做不完，但他希望告訴人家，這是其中的一種方法，這條路可以走。當時開始的時候第一個先印出一薄本的《釋且》，做爲一個體例。後來當時的教育部長張其昀先生很欣賞，認爲這種事情應該做，所以由教育部成立一個專案來做。做的時候有很多人幫忙，當時他還在世界書局做事，他每天晚上寫，寫的非常快，他每天晚上寫的東西，第二天可以給十幾、二十個人做，由他們幫父親找資料。他寫的非常快，所以沒有幾個人能夠看得懂他的字，由於有人把那些資料找出來整理，所以經過一段時間後，就做出來了這一本《一字長編》，這一冊只不過是個「一」字而已，所有從「一」開頭的詞。

林慶彰先生：

據說楊家駱教授後來也有跟日本或美國合作的計畫，不知情形是怎樣，是不是可以請您談談。

楊思成教授：

事情是這樣的。「一」這個體例做出來以後，就碰到張其昀先生從教育部長卸任，那時候父親就擔心，因爲這種事不是一個專案能做得了的，以專案計畫來做，大概只能做出這麼一本。這個工作實際上是要很多人合力，最好能夠激起社會上對這事有興趣的人，集中力量來做，靠政府支持把事情做完，非常不容易得到共識。所以他就決定事情到這裏告一段落就夠了，免得以後變得複雜，所以那個時候，就這樣斷了。

後來日本有個「寫真植字株式會社」，就是印《大漢和辭典》的。像《中華大辭典》這麼大的辭典，有很多字是普通字典上不用的，所以除了「一」以外，將來有很多字要新製，當時還沒有電腦打字，若造鉛字的話，工夫不小，花費也不小，當時《大漢和辭典》就是做鉛模花費太大了，所以就應用到「寫真植字」的技術，當時來講是相當先進的，就是以投影的方式，照相製版。一個新字只要在玻璃版上寫出來，然後用光學投影縮小，一個原來寫得很大的字縮小，字也可以用，品質也很好，成本也減低。他們印完《大漢和辭典》以後，就要找第二個可以應用的地方，他們的社長就有個志願，希望利用這個技術幫助這本最大的辭典早日出來。所以他們是主動和父親接觸的，後來就有一個日本公司到臺灣來投資，是跟臺灣合資的，因為這個方法也可以應用到其他印刷業上，這個公司就以印廣告等一般商業為主，但在機器不忙時就排印書，當時父親也投入資本，不幸那個公司因為經營不善，不到二年就關了。關了以後，日本「寫真植字株式會社」的創始人，也就是技術發明人的女兒，那時她當社長，她繼續她父親的志願，就是把稿子送到日本去，當她們的機器有空時就排印。記得那時候有，不過後來母親生病，父親大概就沒辦法提供這些稿源，以前知道的是有些稿子在她那邊排印，至於目前的情形怎樣，可能要我有機會，再到日本看看。

楊晉龍：

想請教您楊家駱教授的藏書，現在都已經贈送給文哲所了，不知道是否可以請您談談這些書的性質。

楊思成教授：

先父私人藏書都是他平日有用的書，內含一些原始資料已印成書流傳的，也有他平日使用的工具書，雖然數量不少，但其中沒有任何可以稱為珍品或善本的。他買書都是以他是否需用而作取捨，所以這批藏書多半是民國以後出版的書，據說其中有幾部大部頭的書在外面不容易找到。

楊晉龍：

楊家駱教授的手稿，現在也都贈給文哲所了，是否可以請您談談這些手稿的情形。

楊思成教授：

父親的遺稿有《中華大辭典》、《中國圖書大辭典》、《國史繫年》、《各省著述志彙編》等幾種。

關於《中華大辭典》已如前面談到的，雖然有相當大篇幅的稿件，但仍大部未完成。這是所有遺稿中最大的一部。

《中國圖書大辭典》的原稿暫裝訂成約一百七十冊。這部書是中國書名的辭典，對每本書的內容及版本作簡介。這本書的目的是包羅所有能找出依據的中國書，現有的稿並非來自世界各圖書館或出版商所有的書。中國的古書有很多不見得在圖書館可以找到，但如果在其他的古籍中曾評介或引用過的書都在這部書名辭典的搜羅範圍內。只要有可證實的版本、作者及部分的內容資料，我們就知道這部書曾被刻印過，目前已有的稿件多半是從古籍中摘取出來的引用書名及相關資料。當這一類的資料與世界中文圖書館的聯合目錄相對照之後，我們就可能知道中國有那些書未被圖書館收藏，這時我們就知道有那些書是值得向民間查訪的，這對於擴大中國古籍的使用有幫助。先父常提到的另一個用途是作為有興趣從事「集佚」工作的學者的一個工具書。某些書現在已佚失，但因《中國圖書大辭典》上註有在另外幾部書中曾引用或部分重抄或重印過。從事「集佚」工作的人，可以據此而將被引述的部分集合起來，而使佚失的古籍有機會回復其部分的面目。先父曾與朋友及學生們做過《永樂大典》的集佚，他認為這是很有意義的工作，這部稿子離完工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國史繫年》是從古書中摘出所有中國人文社會活動，確知其發生的時間的事件，這也是一部工具書。古人治史多以政權及軍事的變遷作為脈絡，很少以經濟、科技、藝術作為脈絡的歷史，這部工具書應對想以不同角度治歷史的人有幫助。

《各省著述志彙編》是一部幫助學者尋訪地方上所刻印書的工具書，這些稿件都為數不少，但仍未完成。由於我對於中國的文史完全外行，以上的介紹不見得準確，這還有待文哲所的專家們在開箱以後鑑定。

楊晉龍：

關於贈給文哲所的书和楊家駱教授的手稿，不知二位楊教授希望文哲所如何配合或如何處理？

楊思明教授：

我們希望將來文哲所新館落成之後，在貴所圖書館設專櫃陳列，並且希望開放給需要使用的人有機會用到。聽說文哲所也有人做相關的研究，所以我們覺得這是個很好的地方，也很方便給別的有興趣的人來看。另外稿子的部分，假如將來有人有興趣，能夠繼續做下去，這是我們最大的一個願望。

楊思成教授：

思明提到的方便使用的原則，這也是配合父親收藏實用書的做法，他的興趣是普及知識的運用，讓做研究、做學問的人，可以很方便的找到資料使用，也給不專門研究的人，有機會接觸到中國文化的遺產。因此我們希望盡量的方便需要使用的人，當然從紀念上面著眼，我們希望能夠設一個專櫃，但我們希望這些書籍、文稿的目錄編在普通目錄裏，讀者查目錄時，不需要再到另一個櫃子去查，只不過在上面註明這書在某一個專櫃上。希望設這個專櫃對他作紀念。

關於稿子，是希望有人能夠用，最好、最高興的是有人有興趣繼續做這個工作，希望做研究者能夠使用到這些資料。稿件如果經常使用，是不是能複製、複印一份裝訂起來。如果只是偶爾用一、二次，那也沒什麼必要去花這個工夫，就讓使用的人直接去看好了。如果要符合使用人的方便，當然是開架式最好，也許把複印本擺在那邊，可以讓人家隨時翻閱，更符合父親的願望。此外可考慮製微卡或微卷，以利流傳到其他圖書館。

楊晉龍：

最後請教您一個問題，就是楊家駱教授為什麼願意花一生的工夫，奉獻在這種中國文化遺產的蒐集和推廣工作上？是否可以請您談談！

楊思成教授：

這個問題是父親經常談到的。父親沒有經過一般的教育系統，所以思想較不受升學主義教育的束縛，我們經過十幾、二十年的教育束縛，常常思想上比較不是那麼自由，父親是思想上相當活潑的人，他常常在看書後，能夠把一些看法聯貫起來，形成一個見解，這些也往往變成學生的論文題目。由於思想的活潑，他很覺得

中國古籍裏面，的確包含很多智慧，歷史、傳統的一些東西有的很寶貴，這些寶貴的東西，我們應該要活用它，怎樣活用呢？就是從原始資料下手。如果是看一些靠幾個人把資料濃縮後變成的教科書，就會受到當初寫書人的想像力的限制。所以他一生的想法，就是要盡量使用原始資料，走入原作者當初原來的樣子。

父親所做的工作就是介紹、引導的事，使人很容易的能夠接觸到原始資料。他認為接觸到原始資料後，再加上適當的科學方法，才能活用。他很早就認為科學論文的方式很重要，做任何一件事情，應該要做到有科學精神，你說一句話一定要能拿得出證據，比如說古人曾說什麼話，那麼這句話從那裏出來的？為了避免斷章取義的事情發生，你更要找出那時候的社會背景，以及當時作者說那句話的背景用意，樣樣都要符合，所以一定要找到原始資料。

父親一直覺得原始資料才是中國文化的財富所在。使每個人都能夠接觸原始資料的話，是最能拈取中國文化好價值的方法，所以父親一生的工作都環繞在這件事上面，他說他的使命就是怎樣讓人方便使用中國知識，因此他要印書，他要編書，他要製索引及評介。到了晚年，我勸他多寫點自己的意見。他說：「來不及了，沒有時間，編書更重要。」一般來講，編書不是著作，因為是別人的著作。但父親的想法是希望提供一個方便人家的工具書。

父親一生最喜歡跟學生上課談學問。母親過世以後，我們覺得他一個人住在溫州街太寂寞，曾經希望他搬到妹妹家，或到美國住，但他一直不肯，他一直在臺大圖館系兼課，他說學生到家裏來上課，是他最高興的事。談論學問他也最有興趣，在過世的前一天，還和翁同文教授談了三、四個小時。他一直認為自己的身體很不錯，過世的當天早上還跟我通電話，談論跟美國國會圖書館合作的事，只講不太舒服。我在美國早上起來打電話回來，是妹妹在家裏接電話，說已送到醫院了，雖然很突然，但唯一可以告慰的是：由於突然辭世而避免了病痛的折磨。

楊晉龍：

謝謝二位接受我們的訪問，謝謝！